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赵
磊
著

国际视野中的
民族冲突与管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D562

11

013069210

赵磊 著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国际视野中的 民族冲突与管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航

C1676378

D562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 / 赵磊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097 - 4980 - 7

I. ①国… II. ①赵… III. ①民族问题 - 研究 - 世界
IV. ①D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4625 号

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

著 者 / 赵 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关晶焱

责任校对 / 李卫华 徐兵臣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980 - 7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30

字 数 / 50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韩方明

副主编 贾庆国 柯银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义桅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刘 宏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余万里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庞中英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贺文萍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赵 磊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赵可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副教授

赵进军 外交学院院长, 前中国驻法大使

-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 唐小松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州外贸外语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 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 黄友义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
-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 熊 炜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总序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既是中国执政党自我认知的跃升，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力提升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走向自信的标志。“道路、理论、制度”方面的自信，只能在特定的国际大背景下才能得以体现，只有民众对国内外的道路、理论、制度有较客观、全面的认知后才能被认可。

在国际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受到的尊重和指责同时增多。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与很多国家的外交活动都迎来“阵痛期”。朝鲜局势、领土争端等国际热点问题不断考验中国的民众理性和外交智慧。其次，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动，国际问题对策影响世界局势和国内稳定。受国际局势变化和突发事件影响而引发国内动乱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为鉴。对决策者来说，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十分迫切，其中，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再次，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史无前例地提高了民众对公共事务、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无序快速的内容传播模糊了国家界线、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区别。从此，外交与国际关系不只是政治家、外交官、学者等少数精英参与的“专业学问”，而是呈现明显的“平民化”特征。

所以，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的提升十分迫切。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反日游行中，许多过激行为导致无关人员的个人财产和公共利益受损。“砸车事件”等过激行为爆发有媒体报道、媒体引导、暴力泄愤等诸多复杂的背景，但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问题引人关注。应当看到，在因国际问题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中，绝大多数人是怀有爱国热情的，非理

性的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问题全貌和本质的不了解。当前国内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偏见和非理性关注影响、牵制了国家层面的外交决策,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往往盘根错节,十分复杂。而在关系到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上,普通民众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难以理性对待。在这种背景下,尽最大努力提升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显得十分迫切,尽最大可能让民众情绪与国家整体外交方针基本吻合,而不是相反。

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效应在满足民众国际问题信息需求方面,媒体的国际报道迈出可贵一步。近两年,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节目中国际问题评论员明显增多。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学者走入人们视野,为大家分析国际局势和中国作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民众对国际局势信息的巨大需求,同时是中国加强民众国际素养教育工作的表现之一。

相应地,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普及也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时效性的要求,媒体的国际报道往往注重现象描述而缺乏背景解读,甚至不乏“不实消息”。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长期观察、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恰好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普及显得十分迫切。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他们精通国际规则、知晓中国国情,很多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很受关注,国内民众却知之甚少。向国内民众普及国际关系知识、提高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相关机构社会责任之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察哈尔学会是一家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思想库,自2009年10月成立以来,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组建了一支具专业精神、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目前,学会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杂志《公共外交季刊》,邀请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每年主办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还推出了我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教科书——《公共外交概论》(第一、二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公共外交丛书——“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已出版7部专著)。

今后，察哈尔学会将继续秉承“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的理念和原则，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主办、协办一些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传播与实践活动。

此次推出的“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环，也是继“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后的第二项丛书计划。

察哈尔学会将继续努力，推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最新成果，同时激励中国社会各界对国际问题展开理性的建设性辩论，不断推陈出新，把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与我们合作，为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主席

2013年6月

序 一

韩方明*

赵磊博士是我担任主席的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研读了他的《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书稿。这是他承担的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他在英国、瑞士、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的理论思考，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以国际视野研究全球民族冲突管理的最为专深的学术著作。

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由国家间战争转变为一国内部冲突，而民族冲突是国内冲突的重要起因，全世界依然有众多国家存在民族冲突甚至分裂的问题。我赞同赵磊博士的观点，即民族冲突管理应包括源头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化解的全过程；民族冲突事件的发生，不仅有内因，也有外因；应对民族冲突事件，不仅对内要做好工作，而且对外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书稿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要兼顾群体平等与个体平等，但最终的趋势应实现从群体平等到个体平等的转换，即从以民族为单位的平等转为以公民个人为单位的平等，群体平等是将优惠政策建立在‘民族身份’的特性上，而实现个体平等则要将国家政策建立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敲，但其学术起点显然是出于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关切与责任。在欧美各国民族冲突管理的经验比较中，可以发现欧美各国普遍把本国少数民族群视为“文化群体”，对于这些族群成员作为本国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公民身份”和“文化群体”的角度予以保障，而尽可能不把他们视为具有某种独

* 韩方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立性的政治群体。因此,面对世界民族议题的风云变化,中国的民族工作和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要广泛且深入地进行国际调研,不仅要调研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要调研同中国边疆民族有密切关系的周边国家。进行实地调研,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国际比较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与差距,也可以使我们在深刻反思中找寻中华民族对内凝聚、对外影响的持久动力。

关注中国民族关系的细节问题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如“民族”的翻译问题,赵磊博士建议“中华民族就用 NATION,五十六个民族用汉语拼音 MINZU”,“学术分析上可以使用与国际接轨的族群或族群冲突管理(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概念”。的确,民族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意细节,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我们到目前做得还不够理想。

该书以丰富的史料、翔实的数据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冲突管理类型进行了整体性描述和系统性分析,并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其研究成果必将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所有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官员和广大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有所受益。

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思想库。自成立以来,学会始终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有影响力的智库,主动参与国际社会的学术对话,发出中国民间的声音,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同时,察哈尔学会高度关注国际社会的民族冲突与管理问题,对中国的民族冲突管理工作与研究尤其重视,于2013年4月成立了“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并聘请赵磊博士担任中心副主任,我极期待他在此领域有所作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融洽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石,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能贡献出国家切实需要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思想火花和智慧结晶。

是为序。

序 二

秦亚青*

赵磊博士的《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是我国学者运用国际视野探索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以及社会整合的复杂性互动和规律性特征的第一部实证性专著。这部著作凝结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和不倦的探索精神，相信它的出版会唤起国内外学界对民族冲突管理的关注以及学术共鸣。

选定民族冲突管理这一研究主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颇具挑战性。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内部民族关系是否和谐是考察其社会整合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虽然历史上不乏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案例，但民族冲突也是频繁发生的现象。民族冲突是民族关系的一种极端形态，如果把历史截成不同的时间断面，可以发现不同的民族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处在不对称的发展水平中，不同民族群体为稀缺性资源而展开持续的争夺，如土地人口、宗教信仰、血缘融合、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升迁空间等。这就凸显了对民族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民族关系正处于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复杂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进程中，在民族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研究议程需要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之上。一旦发生民族问题，需要邀请民族专家、宗教专家建言献策，也需要从国际视角审视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民族冲突管理不仅对内，而且对外，民族冲突管理本身就包括对国际干预的有效预见和理性

* 秦亚青，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应对。当今世界,国际国内密不可分,许多民族问题具有国际背景和国际影响,甚至转化为国际问题。反之亦然。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国际视野,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观察民族问题。

赵磊博士的著作正是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富有意义的努力和探索。他在书中首次明确了民族冲突管理具有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将民族关系、冲突管理和国际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不仅对正常情境下的冲突管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而且对遭遇威胁情境的冲突管理更是做了潜心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他对国际干预的新进展和新特征也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国际干预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一书至少在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示。

第一,力求实现学术创新。研究内容既涉及世界民族冲突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又涉及国际干预、民族冲突管理等一些高层次的学术前沿问题,研究视野广阔,分析框架清晰。诚然,做学问不是为了追求时髦或者标新立异,但是,墨守成规必然导致学术精神的死灭。从国际视野对民族冲突进行学术研究,为人们理解民族冲突以及冲突管理开拓了新的视野。

第二,强调民族冲突管理。作者运用于中国民族关系与民族事务研究,并对民族冲突管理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细致分析,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作者不仅分析了四类国家的民族关系:移民类国家的民族关系,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关系,如英国、法国等;传统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如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小国的民族关系,如新加坡、瑞士等,还具体研究了上述国家的民族政策选择、模式选择和认同管理,比较深刻地讨论了它们的经验异同以及对中国民族冲突管理的借鉴意义。

第三,精选实证案例。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很多针对性的案例,严谨的实证研究加强了学术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分析积极的国际干预时,选取了国际联盟对芬兰奥兰自治区的干预、联合国对东帝汶独立的干预、欧洲联盟对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的干预等案例;在论述消极的国际干预时,重点对科索沃独立以及卢旺达大屠杀进行反思;在消除威胁情境研究中,对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解决民族冲突的灾难管理、马来西亚如何为民族接

触创造良好的社会规范与接触情境、印度地方性政党如何发挥民族冲突管理作用以及北爱尔兰萨福克-列拿度沟通组织如何通过草根路径化解民族冲突的案例进行了系统分析。这种细致、严谨、遵循科学精神、恪守学术规范的实证性研究正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所需要的。

《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成果将有利于增强中国民族工作的预见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民族问题，也有助于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民族冲突管理。

序 三

马 戎*

中央党校的赵磊老师完成了一部书稿《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范围很宽，不仅讨论了“民族”这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和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历史，介绍了各国在近代推动的“民族构建”进程，介绍了世界各国政府在民族（族群）关系方面设立的各种制度与法律，详细介绍了历史上各国“民族”构成演变和“民族冲突”的许多案例，介绍了许多国家的族群优惠政策如语言政策等，同时还汇集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涉及“民族”概念和相关制度、政策问题等的许多不同观点，这部书稿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文献、跨越历史与现实、结合抽象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综合型研究。在各类知识信息的综合梳理方面，这一研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近些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与民族和宗教因素相关的群体冲突、治安事件和暴力恐怖活动，引发了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发生了这些事件后，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盼望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和分裂。尽管中国与苏联的发展历史与基本国情不同，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政治风险，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具有危机意识。试问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的苏联研究机构，苏联自己内部也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有谁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个超级大国即将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发生解体？我一直在讲：“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自建党之日直至建国后的执政，斯大林民族理

* 马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

论和苏联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仍然在大量重复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论述，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因此，在苏联解体后，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非常有必要在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反思我国实践了60多年的民族理论、制度与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探索适应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21世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思考民族关系的引导思路和设计民族冲突的管理机制时，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第一，必须拓展我们的视野。世界各国的国情特点和历史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是自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譬如发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理念对各国“民族国家”构建就发挥了重要影响。所以，在各国的民族（族群）关系发展特点和管理方法方面，各国既存在各自特性，但同时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其他国家在对待国内“民族”认同、“族群”关系方面提出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不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我们都需要借鉴和参考，而不能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简单地排斥必要的比较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选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发明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社会矛盾。例如，新的通信技术（手机和互联网）使信息传播模式和速度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每个国家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管理思路和方法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态势进行调整，努力与时俱进。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放弃“凡是”类的教条主义思维习惯，广开言路，在开放式的讨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逐步达成共识，推动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回顾我们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也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指导下闯出来的。因此，今天我们面临中国国内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也必须采用

这样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三，由于汉族在我国总人口中占90%以上，汉族地区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占据优势，汉族干部在各级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调整我国民族关系的主动权、改善我国民族关系的钥匙掌握在汉族手里。在调整我国民族关系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必须在我们的内心时刻反省“大汉族主义”的余毒，对于这一点，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强调过多次。我们必须持续、坚决地反对一切事务以汉族为中心、反对以汉族地区经济模式和文化作为标准来衡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各级政府要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他们对于自己如何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愿。如果我们的干部和民众以汉族的“标准”来评价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落后”、“迷信”，看不起少数民族，这种偏见和歧视的态度必然伤害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并导致民族隔阂。如果有些汉族干部把当地少数民族视为“不可信赖”的人群，那么以汉族为主导的政府也就不可能获得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的信赖，我国民族关系的调整就无从谈起。因此，任何地方的民族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汉族干部首先要检讨和反省自己的观念、言行和工作作风，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众。

第四，我们今天依靠什么来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

近些年中央在西藏、新疆工作中一直强调“发展经济”和“关注民生”。发展经济可以改善当地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是何等强势，当时的红军、八路军在财政上非常困难，自己节衣缩食，也没有多少资金去帮助民众，但是我军所到之处仍然争取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建国初期，新的人民政权在财政上同样极为困难，但是我们在西部新解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争取了支持国家统一的部分政治和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少数民族大多数贫困民众的支持，摧毁了当地的反动势力，迅速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今天，政府的财政能力、建设能力绝非昔日可比，但是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反而在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真正关键，在思考民族问题时的“经济决定论”很可能会误导

我们的努力方向。

民族、族群关系的核心是认同问题，我认为这些年我国民族关系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人们在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问题。人类学常用的一个词是与“我们”对应的“他者”，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是把彼此视为“自己”还是“他者”，这是在群体关系中理解认同意识的核心与关键。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人群不把另一个人群视作“他者”呢？毫无疑问，体质特征、语言、宗教、传统文化方面的差异，都是人们辨识“我们”与“他者”的标志和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把这种传统观点进行绝对和僵化的解读，那么不同的人群之间就是绝对不可能彼此认同的，只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民族之间的认同问题似乎就陷入“无解”的困境。

再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自己走过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和 50 年代，当时以汉族为主、不懂少数民族语言、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解放军和新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如何赢得各地少数民族广大民众的欢迎和爱戴的呢？因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宣扬共产党“消灭宗教”、“共产共妻”，少数民族当中有许多人一开始对共产党充满疑虑，所以在解放军刚刚进入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当地群众一度与解放军保持距离，不相信我们关于“民族平等”、“尊重宗教”的宣传。但是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们在积极学习当地民族语言，尊重寺庙和宗教人士，尊重地方民情风俗，积极为民众治病救灾，帮助民众进行生产，通过战士们的这些实际行动，最后逐渐打消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疑虑，为随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政权建设打下了群众基础。可见是否存在语言障碍、我们自己是否信仰宗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的是我们要在心里把这些少数民族民众真正当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来关心、尊重和爱护。话听不懂可以打手势，心中的真诚通过眼神和手势是完全可以被对方感受到的，我们所做的事，对方都是看得见的，只要我们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群众就会接受我们、认同我们，发现了问题会及时告诉我们，遇到难题会帮助我们出主意，支持政府推动的各项工作。我们把少数民族群众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群众也就会把我们的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政府”。

尽管不同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